

第一部全景式反映陇中沉浮变迁的长篇报告文学
展现中国扶贫开发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历史画卷

国家任务

郑新●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国家任务

陈鹤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任务

郑新●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任务/郑新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06-8073-4

I. 国... II. 郑...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8970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 (010) 64065904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4.75印张 2插页 235千字

2008年3月北京第1版 2008年3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2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目 录

引 言 行走在苦瘠与富庶的边缘	001
第一章 土殇,或以泪为水	006
1 寻找“左公柳”	006
2 天平失衡	009
3 水窖里的凄美绝唱	012
4 洪灾,发生在大旱之年	015
5 渭河断流	018
第二章 生死线上	021
6 天绝人寰	021
7 “左”祸与穷根	024
8 通渭问题	029
9 “红旗”浸透的血泪	033
10 周恩来没有想到	035
第三章 如果我的天不够大	040
11 引洮上山之痛	040
12 大坪,不能忘却的记忆	044
13 走申家山路	048
14 风雪华家岭	051
15 红嘴山上新愚公	054

第四章	中国扶贫开发拉开序幕	059
16	一个国际性话题	059
17	远古的呼唤	064
18	反饥饿试验	068
19	富饶的贫困	072
20	“三西”之路	075
第五章	青山作证	081
21	一把瓦刀传新风	081
22	两座丰碑	083
23	比长城伟大的工程	086
24	将树种在我的脊梁上	090
25	柠条图腾	094
第六章	未来由谁决定	097
26	省委破例开会	097
27	甘肃农业领跑全国的背后	101
28	移民新生	104
29	贫困不相信承诺	110
30	后退没有出路	112
第七章	出走与回归	115
31	走出“半边天”	115
32	一把镰刀闯关中	118
33	“铁匠”兄弟	120
34	开往春天的地铁	123
35	蚕豆缘何变青豆	126
第八章	向愚昧宣战	131
36	钟声,在大山里响起	131

37	无悔青春	135
38	不能承受之重	138
39	上书教育部	142
40	西部志愿者	147
第九章	新儿女英雄传	153
41	一生志在富民	153
42	八年,四十八次的牵挂	157
43	洮河赤子	161
44	同济之爱	165
45	巾帼不让须眉	168
第十章	千古欣喜入梦来	173
46	小康第一村的诞生	173
47	重任在肩	176
48	为国药加码	179
49	与金华结缘	183
50	奏响扶贫第三部曲	185
第十一章	曙光正在升起	190
51	探路者	190
52	“倒蛋部队”急行军	193
53	转型之后	196
54	价格博弈	199
55	幸福像花儿一样	203
第十二章	沿着旗帜的方向	207
56	太平村纪事	207
57	在“中国花卉之乡”	210
58	请喊一声:跟我来	212

59	一个很好的做法,一条很好的经验	215
60	支部建在协会上	217
并非尾声 我们走在大路上		219
后 记 灵魂迟到的坚守		223

引言 行走在苦瘠与富庶的边缘

中国有多少贫困人口,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当父辈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可能感到陌生;当父辈的父辈说起解放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的苦难,我们更感到遥远。我们只依稀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包产到户”,使千千万万个贫苦农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农民对土地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粮食开始连年丰收。尽管这样,中国当时还有两亿五千万农民吃不饱肚子,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点七。这是中国第一次对贫困人口做的比较全面准确的统计,至今已快三十年。那时,高达两米的巨型肖像油画《父亲》,第一次把领袖享有的殊荣给予了一位普通的穷苦农民。这位满脸皱纹,布满老茧的双手捧着破碗的老农形象,最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为行将消失的贫困的农业文明留下了最珍贵的文本。紧接着,人们便看到,中国推行了让全世界都为之侧目和惊叹的人类反贫困事业。政府拿出了壮士断腕、气吞山河的魄力,一次次承诺要将贫困人口消灭,贫困人口一年年在减少,到现在却还没有完全消除。这显然不是仅靠政府的决心和农民的意愿就能完成的。中国的扶贫开发走过了一段怎样艰难曲折以至反弹反复的过程,很多人无法理解。

黑格尔,这位西方大哲人尚且同情地称中国为“灾荒大国”,亚当·斯密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怜悯中国古代“贫民的生活状况比欧洲乞丐还要悲惨”。中国历史上,能吃饱饭的盛世远少于易子而食、折骨为羹的灾荒岁月,农民几千年来都是在半饥饿中坚忍不拔执著顽强地走过来的。将一个先天不足却又老态龙钟的“畸形儿”抚养成人,注定我们要比前人付出数倍百倍的心血和气力。

应该说,俯首为牛的共产党人和一大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对此是十分清醒的。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上大声疾呼：“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陕甘宁边区时，他对贺子珍讲：“我这个人平常不爱落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也就在那时，穷其一生，为改变全世界上亿底层民众的贫苦命运而不懈奔走的晏阳初博士，在美国纽约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和爱因斯坦、莱特兄弟等一起，被国际学术界推选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伟人”。晏阳初的身体力行，最耀眼地照亮了中国知识分子百年乡恋前进的道路。解放后，当时的热河省便开始了扶助困难户的生产。一九五一年五月，热河省《扶助困难户生产的报告》摆到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的案头时，这位与毛泽东六年前在延安有过一次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著名谈话的民主人士，很快作了批示：“扶助困难户生产，是值得努力的一件事。希望热河省积累经验，使以后困难村户逐渐减少，做出一个典型来。”这算得上是国家领导人就扶贫所做的最早的指示。胡耀邦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也有过精辟论述：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有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也是两个字，叫做“建设”。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不是长江、黄河，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显然深谙此理：“不管天下发生什么大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他连连阐述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更是将扶贫开发看作是解决“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这个最大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二〇〇四年的“两会”上，新一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面对众多中外记者的提问，又一次坦称，农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问题、东西部差距问题，使他觉得“身上的担子有千钧重”。

自周朝开始，采言官们在民间游走采风，以察民意。清晰的击柝声穿越三千年的时空，召唤着我们的责任和良知。今天，当大多数贫苦农民已经解决温饱，转而迈向小康的时候，中国依然还有两千三百多万赤贫人口挣扎在饥饿线上，近五千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对他们命运的关注，不应该是时代所遗忘的；即使已经走出或者正在走出贫困的农民，他们的奋斗历程也是值得记忆的。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记住却是为了更好地忘却。二者其实并不矛盾，我们时时都不能忘了穷人；我们记住苦难，是想让他们更好地生活。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定西，投向了陇中广袤深沉的大地。行走、记录、追忆，我奔波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进行着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

的采访；我沿着布满荆棘的道路前行，期望从源头开始，探寻中国扶贫开发二十多年走过的历程。我发现，年复一年的自然灾害，将这片土地蹂躏摧残得遍体鳞伤，旱魃狰狞、洪魔恐怖，水火不容，却交替到来；地震山摇、冰雹袭击，灭顶之灾，常常不期而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大自然的顽强抗争，是中国历史上撼天动地的伟大壮举。

以定西为代表的陇中干旱地区，在全国十八片贫困地区中，无疑最具代表性；如果就扶贫开发而言，定西就更具典型意义。清光绪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这位生在芙蓉国里的文人将军，乍见陇中濯濯童山、迷目黄尘，不禁发出了“苦瘠甲于天下”的喟叹，此后百年定论，难有“僭越”；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陇中人民衣食无着，周恩来总理几番下拨救灾物资，几次潸然泪下；而首开中国区域性扶贫开发先河的“三西”建设，最早就是在定西燃起的。因此，走进定西，其实就是走进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走近中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我没有想到，岷县秦许乡学南村既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二〇〇四年夏天，我乘坐的吉普车沿河沟、田边、砂石地踉跄行驶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而村民与外界联系，主要靠步行。他们住的还是用石头垒起的房子，有的甚至住着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茅草房。村小学只有一、二年级，惟一的教师徐振华拿着每月一百八十元的代课费，含辛茹苦地教育着山里的孩子，他们一、二年级结业后，要想继续上学，就只能去十里外的鹿峰小学，有的因此辍学回家。

我不知道，在中国，像学南一样的村子还有多少；比学南更穷的村子，肯定也不少。因为交通不便，扶贫艰难；因为人口素质低下，走出贫困路途遥遥。

我更没有想到，到了一九九〇年，“三西”建设实施的第八年、中国提出“七五”期间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农民温饱问题四年后，甘肃粮食连续七年稳定增产、连年用于农业的投入全国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会连续九年位居全国最后一位。定西地区更低于全省水平，陇中最低的东乡族自治县，农民收入仅为二百一十三元。这年的人口普查，甘肃省十五周岁以上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九三，比例之高，居全国之首。也就是这一年前后，陇中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一百二十八人，大大超出国际上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生活七人的负荷极限。

还是这年秋天，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员、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从贵阳给田纪云副总理和陈俊生国务委员写了一封信。他

说在贵州跑了一圈,再也坐不住了,“深山区、石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扶贫开发的难度比预想的大得多,气可鼓不可泄,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尽管有着太多的巧合,但它至少说明,在十多年前,即便从认识上甚至感情上来讲,中国已经看到,今后扶贫开发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和顺畅的。

因为拉开了扶贫开发序幕的缘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先后有近四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定西视察,无数专家学者踏访定西。他们将最深切的关怀留在了这里,将第一手的扶贫经验带出了定西,定西成了中国扶贫开发的桥头堡和试验田。一生中七次访问定西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第四次来到定西时就说:“我是研究农民、研究农村的。研究了几十年,我一辈子关心的就是穷朋友。定西是块穷地方,所以我多次的来。这一次来和我第一次来,感到定西的变化太大了。要是定西以后的变化还是这样大,我也就可以不来了。”江泽民第一次视察定西,留下“群策群力,定西大有希望”的题词,更是激荡过多少人的心。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站在定西县青岚山乡大坪村,环视“山河一新,面貌大改”的土地,充满深情地说:“我在北京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陇中在历史上本来就是富庶之地。春秋时期,森林广被;秦汉时代,“大山乔木,连跨数郡,万里鳞集,茂林荫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到了宋朝,山上“皆林木森茂,峰峦耸秀”,因而“山涧泉流数派,灌溉便利”。定西县“森林极盛”,“浓荫蔽日”,“犹多大树”,北部的山区牧草发达,曾被皇上赐为“牧地”,“唐则为渭州(今陇西)西市贸马之所”。据唐天宝元年的统计,渭州属地有两万四千五百二十人,平均每县只有六千余人;甘肃境内也不过五万七千三百三十二人。《史记》中就有“陇右畜牧为天下饶”的记载。成书于一〇八四年的《资治通鉴》更是写道:“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那时,自秦始皇设置郡县以来,陇西作为中央政权在陇右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已经独霸一方,雄踞天下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巨大的威慑作用,古诗早有赞之:“韩公安抚来春风,威远楼筑在渭滨。凭眺自看西土月,旌旗已靖朔方尘。”它辖地最大时曾领二十七州,现在的陇中各县,历史上大都为其辖境。

从“天下富庶”到“苦甲天下”,陇中的沉浮变迁已难以用天翻地覆

来概括。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远去，陇中却要承受人间浩劫带给的苦难，这苦难留下一个伤痕累累形容枯槁的定西。千年兴衰，千年一叹，历史的注脚也无法诠释困惑。解放后，尽管定西地区的行政区划历经八次变动，最大时曾辖十二个县，最后形成今天的格局不过二十年时间，二〇〇三年九月六日又撤地设市，定西县改为安定区，原定西、通渭、陇西、临洮、渭源、漳县、岷县七县变成一区六县，但它处于甘肃中部——中国脊梁的位置始终没有动摇过。共和国的脊梁在流血，定西实际上成了中国干旱地区的代称，贫穷苦难的象征。

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在定西的土地上行走。我在残阳废墟、西风古道之上，与一页页尚未风干的历史对话；我抚摸着古老民族胴体上没有痊愈的伤疤，感悟着夜色中升腾起的星星灯火；我同时也承载着一个巨大的心灵命题：我在穿越贫困。那是另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背负着历经沧桑洗尽铅华的厚重前行，谁都不会觉得轻松。定西就是这样走来的，她走得更苦更累，现在仍然在坚持。

但她毕竟走过来了。她留下了血印、泪痕、苦水、咸汗，也甩掉了饥饿、贫穷、愚昧、无知；她经历过屈辱、折磨、抗争，也承受了打击、心酸、无奈；她宽广博大，也深沉凝练；她编织了美好的梦想，也憧憬着富庶的明天。

现在，我要讲述的是，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发展报告，扶贫开发二十年的一个缩影。

我想说的是，这是一次生命的嬗变，心灵的洗礼，精神上的苦旅。对我而言如此，定西如此，千千万万个走出贫困的中国农民亦复如是。

第一章 土殇,或以泪为水

1 寻找“左公柳”

历史不会遗忘一位英雄,他的名字叫左宗棠。

历史同样记住了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定西。

关于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从沙俄手中夺回已被侵占十年的伊犁地区,从而使一个完整的新疆重新划归中国版图。那是中国历史上扬眉吐气的一次壮举,晚清风云中可歌可泣的千古绝唱。

关于定西,最著名的话是左宗棠所言“苦瘠甲于天下”的百年论断。从此,“陇中苦,甲天下”的名谣广为传唱,世人尽知。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已是五十四岁的左宗棠由浙闽总督调任陕甘总督。斯时清朝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这位生在芙蓉国里的文人将军,几卷史书相伴,三两随从追随,翻山越岭,挥汗如雨,长途跋涉,直达边关。左宗棠重任在肩,百感交集。二十四年前,蒙受不白之冤的林则徐被充军伊犁,孤独放逐,西行路上,也是雇船解缆,全无车马喧哗。他们的身后,是一个王朝寂寞的背影。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朝廷或褒奖或妒嫉或颂扬或排挤的言辞,对于人生暮年的左宗棠来说,如过眼云烟,无足轻重。自己一生郁郁寡欢,屡不得志,不承想,大西北却给了他无限慰藉。很难说清,究竟是左宗棠“成全”了新疆,还是新疆成就了左宗棠。就像左宗棠之于定西,若干年后,当一段并非如烟的往事褪去时代烙印,我们才发现,二者其实不可分割。

那是左宗棠上任五年后的一天,他和定西知县正在郊外散步,发现山间浓烟腾空,火光一片,忙问怎么回事。知县解释说,这是百姓“纵火

烧荒以肥田”。左宗棠叹息道：“任意烧荒，生植尽矣！”于是发出告示，严禁垦荒，并通令陕甘各地依例执行。

左宗棠或许并不知道，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大面积的毁林开荒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当时，朝廷在今天的天水设有专门采伐森林的“采造务”机构，在现在的陇西和通渭一带“辟地数千里，建堡居要塞，戎座三百人，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宋熙宁年间，又大力开垦天水到渭源的广大田地作为军需所用。从此，陇中原来弃耕的土地和大片处女山地被大量开垦，原有的森林草地再也没有得到恢复。到了明代，受“屯田普天下，而边境为多，凡流民均给土地”的召唤，从山西等地迁来大量移民，陇中人口空前增加，开垦土地达到疯狂的地步，水土流失加剧，旱魔开始吞噬它的肌体。满清政权建立后，仅临洮一县的耕地较明朝就扩大了二十万亩，洮河流域的次生林随之被砍伐殆尽，渭河流域以北广大地区的天然林紧接着也消失了。

即使在“康乾盛世”时期，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未能照亮陇中黯淡衰微的时光。秋树萧森、日渐清冷的定西，“其山童无竹木之饶，其水咸苦无菱芡鱼蟹之利”。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陕甘总督勒保入觐京师，向朝廷禀报时称，“种无法丰年，亩仅收数斗，岁入不供所出，故赋税常不及额”。

西北百废待兴，然军务最为紧迫。左宗棠平定叛乱，收复新疆，不忘开仓放赈，安抚灾民，至今传为佳话。在定西设行辕期间，他对每户灾民均分荒绝田地及房屋窑洞，并拨种子和耕牛发展生产，大人每人发口粮八两或一斤，小孩五两或半斤，爱无差等，人人有份。

左宗棠修路种树开渠挖井，以为民生之利，提出在西北“图数十百年之安”。西行路上，他以树开路，遍栽杨柳，路随人修，树与路立，路旁植树少则一行，多则四五行。从潼关开始，过西安、六盘山、定西、兰州、河西走廊……横穿陕甘两省，再向西延伸，直到新疆的喀什噶尔。

“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左宗棠写道，“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力最勤。”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事实也是如此。据史料记载，从陕西长武至甘肃会宁六百里，植树成活二十六万四千株，仅定西境内就有十万六千多株。《西笑日觚》称：“左恪靖命自泾川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

后人有诗赞曰：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曾经绵延三千里的“左公柳”，如今数目寥寥。在干旱和贫困连年袭来的时候，仍然免不了当作木材与柴薪的下场。左宗棠离任不到三十年，几乎被悉数砍尽。它的速生速灭，更加惊心动魄。“左公柳”下的告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谁又能想得起来？

现在，我正循着左宗棠的背影，行走在陇中大地上。两旁的树木、小草从眼前掠过，我的思绪立刻就跟着飞扬起来。我看见泛黄的树叶夹进记忆的照片，绽放嫩绿芬芳的新枝；我想像还在散发着温热气息的泥土，先民们碾落尘埃走过的足迹；我沉湎于历史的焦灼与辉煌，却也哀叹岁月已逝无法挽留的怅然。我知道，浮光掠影的背后，一定湮没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我要寻找“左公柳”。这种强烈的感情冲动，让我在定西的每一个角落，时时受到兴奋与痛苦的双重惩罚。

它是左宗棠对国家的一大贡献。

它是左宗棠在定西的百年见证。

千年的历史，不变的主题。从汉乐府曲到唐宋诗词，从元代散曲到明清小说，或达官贵人名门淑女折柳赠别、伤春悲离，或宫前殿上江堤湖面柳梢低垂，晓风残月，一丝柳絮载不动万千愁绪。然而，一个人对一棵树的牵挂，一种树对一个地方的依恋，一座城市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这一切，其价值多年以后才被人发现。朱绍良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时，曾下令各地将残存的“左公柳”登记编号，严格保护。如今，哪里是左宗棠的脚印？哪里又有“左公柳”的踪影？

“看，那是什么？”

惊起回头，青岚山上，一棵晃动着金色叶片的老柳树随风摇曳，翩然而至。它长势峥嵘，苍劲挺拔，状如虬怒，气如龙蟠，巨干凌空，直指云天，毫不掩饰苍老的绿色，显示着大自然中植物生命的坚韧与倔强。

这就是“左公柳”吗？

不是吗？前方山峦起伏，树影婆娑，草色泛青，人为雕凿的痕迹还未抹去，它们分明是后来新生的植被。而我的眼前，除了这棵孤独的柳树，

偌大的土台上面，再无其他附着物。它傲然独立，显然不愿老去。它诉说着什么？它期待着什么？

2 天平失衡

定西的破坏与树难分，定西的贫困与水有关，定西的历史与这二者紧密相连。

“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两千七百多年前，中国著名思想家管仲就说过这样的话。从那时起，人们便将河流比作母亲。唐太宗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又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水的重要性和双重性。“农民皇帝”朱元璋，提起稼穡之艰难，每每为之涕泣，“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我们的先祖把这片饱受创伤的土地交给后人时，也不忘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古训：“治国必先治水！”

这水，应该是旱灾与洪涝的并行。我们常以自己的国家美丽富饶而自豪，可是很少有人想过，这里早已是“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的灾害之国”！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也就是左宗棠深知甘肃“非赖各省关协济无所措手”，向朝廷上书“辖境苦瘠甲于天下”的第二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旱。旱情持续五年，受灾人口达一亿六千多万，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以上。灾情震惊朝野，文武官员皆称，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乃“古所仅见”的“大侵奇灾”。华夏民族为此差点灭亡。

据《中国救荒史》统计，中国历史上各种自然灾害，自商汤十八年（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清朝灭亡的一九一一年计三千六百七十年间，共发生五千一百八十一一次，平均每半年一次。其中水灾一千零三十四次，平均三年五个月一次；旱灾一千零六十次，平均三年四个月一次。

旱灾居各种自然灾害之首！

甘肃是中国的干旱大省，二百九十四亿立方米的自产水资源总量，人均只有一千一百五十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亩均耕地水资源量五百六十立方米，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全省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是旱地，百分之七十的降雨量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近百分之七十的农民生活在干旱山区。尤其是陇中，年降雨量只有三百多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两千毫米以上。占承载人口绝大多数的定西北部山区人均